制度与观念:城镇化与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选择*

张　品　林晓珊

摘要:在不断加速的城镇化进程中,究竟是哪些因素在推动着农村社区的住房消费?本文尝试通过相关数据与田野调查,从制度变迁与观念转型两方面,探讨城镇化与农民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城镇化　住房消费选择　城市生活方式　制度　观念

在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是农村人口持续地往城市流动,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家庭义无反顾地返乡建房,已有的诸多研究尚不能完全阐释清楚目前"农村房屋换代潮"这一正在改变中国广大农村发展面貌的新现象。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农民工家庭的住房选择?为什么许多农民纷纷进城打工,但主要目的还是"攒够了钱回家盖房"?为什么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家庭不在城镇买房,而是选择在老家建房?

一、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本文对社会学领域中与住房消费相关的文献进行综合考察,且按照理论视角的差异将其梳理为三部分,分别是结构主义视角、建构主义视角以及文化视角的住房消费研究。其中,结构主义视角主要分析住房消费的制度影响机制,后两种视角则主要分析住房消费的观念影响机制。

结构主义视角的研究着眼于社会阶层结构是如何对住房消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将住房消费置于中国社会制度转型的背景中,探讨由再分配机制到市场机制的转型如何影响住房消费。自1967年雷克斯和摩尔在《种族、社区和冲突》中提出住房阶级理论以来,住房与分层就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李培林和张翼(2000)的研究认为,城市家庭多数租住在公房或按成本价购买的公房里,而公房分配以行政级别或技术级别为等级标准,所以,无论是居住公房还是私房,住房状况上都存在着阶层化的特点。李强(1997)指出,我国在市场化的房屋制度改革以后,房屋或房产已成为居民的重要财产,房屋所有者的经济地位含义就更为突出,住房也成为转型时期城市"地位群体"的一种标志。这些研究证明了人们的阶层地位,包括职业地位与经济地位都是人们住房消费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至于住房分层的影响因素,市场化机制和再分配机制则是两个不断被学者提到的主要因素。边燕杰与刘勇利(2005)通过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证明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的家庭所拥有的住房往往面积更大、质量更好,并以此说明在我国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后,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同时影响着城市的住房分层。刘祖云与毛小平(2012)通过调查数据证明个人的政治资本、人力资本、职业状况及收入水平对人们获得住房资源都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市场机制"与"再分配机制"同时影响着城市住房资源的获得。

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中,一些学者侧重于考察个体能动因素是如何将社会意义赋予或铭刻在住房消费的过程中。消费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消费者购买物品并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消费者进行"意义"建构、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住房消费作为

* 本文曾提交中国社会学2013年学术年会,并在"消费社会学"论坛中宣读,感谢王宁、吕大乐、张敦福等诸位师长及与会者的批评与建议;感谢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张兆曙教授等人的指导意见。文责自负。

一种消费行为也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周运清(1991)认为,住宅的使用差异是人类社会隔离的指示器,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的阶级隔离、种族隔离和贫富隔离。刘精明与李路路(2005)利用200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不仅证明住房消费呈阶层化的趋势,并以此认为人们通过住房消费的行为再生产自己的社会地位。陈昕(2003)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农村居民新建与装修住房主要是注重住房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即主要为了表现与攀比。闵学勤(2011、2012)的研究发现城市青年在参与住房消费过程中已呈现仪式化倾向,他们的购房行为已从集体消费转向集体展演,对住房的认同已从经济资本扩展到符号资本,由此建构的住房阶层也正演绎为住房神话。

在文化的视角中,一些学者集中考察农民走出集体化村庄后是如何从新兴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念或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念中抓住契机,掀起一波波的建房潮。阎云翔(2006)探讨个人主义价值观与农村居民住房修建与装修之间的关系。从他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私人空间的出现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私人生活转型的伴生物。受这种私人空间安排的影响,家庭隐私权(客厅,高墙大门)与个人在家庭的中的隐私权(独立卧室)得以保障。同时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也因此而变化,尤其是等级关系与性别关系得以改变,人际关系逐渐实现平等化(阎云翔,2006)。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一样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还有消费主义价值观。陈昕(2003)通过对北京周边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发现在这三个村中,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文化主导权性质显而易见。卢晖临(2006)则通过讲述改革开放之后发生在一个中国村庄里的楼房竞赛故事,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农民平均主义心态,但是他并没有将平均主义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利用田野资料,结合更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探讨集体化经历与这一心态形成之间的关系。

在上述研究中,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从城市社会制度变迁的背景,即从再分配机制过渡到市场化机制,考察城市居民的住房消费行为与城市居民的住房消费分层。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城市居民的住房消费问题,关于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选择的文献还不多。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城镇化的潮流之中,在城镇中有着大量的流动农民工,由于各种因素,他们虽置身城镇,但却无法在城镇安居,他们的家与家人仍然留在农村社区之中。这些农民工及其留在农村社区的家人的住房消费选择关系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因而他们的住房消费选择亟需学术界的关注。

在文化视角与建构主义视角的住房消费研究中,学者们以文化变迁为背景,从个人层面探讨与住房消费相关的问题。但是,他们仅仅在农村社区的社会空间中讨论消费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与平均主义观念对于农村住房消费的影响,缺乏在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对城市—农村这一连续体的互动考察。

本研究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选择是多元的,但却深受制度变迁和观念转型的影响,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农民工家庭推向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同时,“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又牢牢地将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选择束缚在乡土家园之中。本研究企望在上述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形成以下的分析框架(见图1),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行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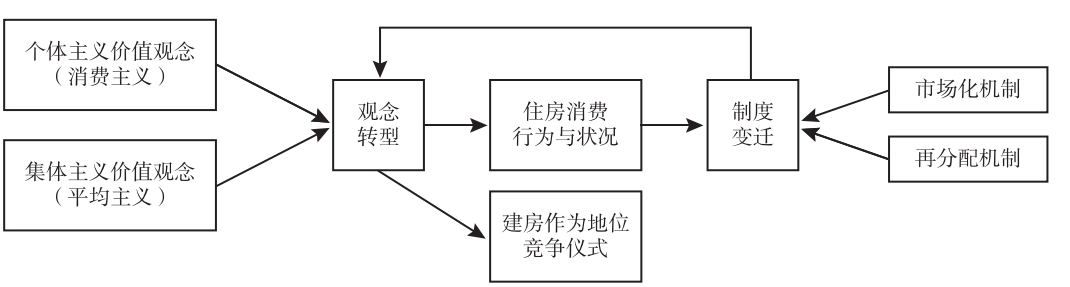

图1　农民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分析框架

二、方法、变量与策略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本文主要从制度变迁与观念转型两个方面对农民工住房消费选择进行分析。相对而言,制度机制是可以操作化的“客体性”内容,201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数据库有相关的数据可以利用,因此主要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①;而观念机制,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内容,更适合采取定性的访谈与观察的方法进行研究。

在制度影响机制的分析中,本文通过对 CSS2011 数据进行相关处理,描述统计与多元线性回归对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选择的相关制度因素进行分析。由于农村的住房消费一般是家庭集体的消费行为,在 CSS2011 调查数据中恰好有“农村家庭住房改建与装修的支出”这一变量,通过对它的分析我们可以间接发现农民工回乡建房推动农村住房消费热潮的制度因素,因此笔者将此变量作为因变量。

为了分析市场机制对于农民工住房消费选择的影响,笔者从可以选取的变量中选取最可能受市场机制影响的家庭非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的自变量。同时,根据相关调查,近年来医疗与教育支出成为农民工家庭最重要的负担,因此我们还选取家庭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对家庭住房消费选择的影响,这些变量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再分配机制对于农村住房消费热潮的影响。“农村家庭住房改建与装修的支出”这一变量为定距变量,因此适于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这是学界使用较为普遍的基本模型。

在观念影响机制的分析中,笔者主要通过对我国中部 C 县的一个村庄的居民住房消费状况与住房消费选择的原因进行观察与深入访谈,从中发现不同价值观念对于其住房消费的影响。在访谈中,我们主要询问受访者在农村建房的原因、城市生活方式对其返乡建房的影响、城乡生活经历的比较对其住房消费选择的影响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本研究采取目的抽样法选取 10 户居民进行半结构式的深入访谈。受访者基本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受访者资料与访谈情况详表

编　号	受访者	受访者职业	访问时间
01 – M – Z	张某	建筑包工头	2012 – 12 – 12
02 – F – L	李某	装配工人	2012 – 12 – 16
03 – M – H	黄某	汽车司机	2012 – 12 – 18
04 – M – L	李某	食品厂工人	2013 – 01 – 03
05 – F – Z	张某	建筑小工	2013 – 01 – 08
06 – M – Y	杨某	电脑城销售员	2013 – 01 – 11
07 – M – G	郭某	修理厂小工	2013 – 01 – 13
08 – F – L	刘某	制衣厂工人	2013 – 01 – 15
09 – F – Z	张某	建筑工人	2013 – 01 – 17
10 – M – G	郭某	农民	2013 – 01 – 20

三、农民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的制度影响机制

根据已有的调查,我们发现,在城市打工的大多数农民都陷入住房消费困境之中,他们中很少

① 本论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培林。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负。

有人能够租住在稳定、宽敞与舒适的住房中,能够在城市中购买商品房的更为罕见。大多数人只能飘在城市边缘,一方面在城市周边租住房屋,另一方面在农村建设现代住宅。在城镇化背景下,上述的制度变迁是如何推动这种现象的出现呢?

(一)农民工家庭城市住房消费的困境

从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其住房消费有两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种住房消费类型是租住在廉价的房屋之中,这类住房消费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个人租住在一间空间极小的房屋之中;另一类是一群人集体租住在一些成套的房间之中。这两种类型的房屋消费形式用网络的流行话语概括,分别叫做"蜗居"与"蚁居"。这类房屋比较简陋,内部环境也非常差,房间内很少有空调等取暖与防暑设备,房间也很少有单独的卫生设施与厨房设备,而且这类房屋一般都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第二种住房消费类型的房屋质量要比前两种更差,他们是建筑工人在建筑工地上自己搭建的临时钢板房或者其他类型的棚户。他们在城市中,通过艰苦的劳动将一幢幢房子建好,却几乎不可能获得或者租用他们的劳动成果。

表 2　　农民工收入与居住房屋类型关系表

收入等级	农民工城市居住房屋类型					
	旧城区房屋	单位宿舍	保障性住房	普通商品房	高级住宅	城郊村
低收入者	173	92	13	149	1	146
中等收入者	50	46	2	76	0	52
高收入者	35	14	5	58	2	29
显著检验	卡方值 = 30.5, df = 10, p < 0.01					

注:本数据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CSS2011 数据进行处理并分析制出。其中的收入等级是根据被访者 2010 年的总收入的不同而分成主要的三类。年收入低于 20000 元的为低收入者,20000 – 50000 元的为中等收入者,高于 50000 元的为高收入者。

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城务工经商的群体中,低收入者占据主要部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居住质量要比这一群体中的高收入者差,而高收入者的居住质量也并不高。显著性检验显示,农民工的这种住房消费的困境与其收入有着显著的关系,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分配影响着他们的住房消费选择。

市场化机制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日趋严峻的两极分化,因而需要通过宏观调控与再分配机制来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那么城市中的再分配机制是不是有利于改善农民在城市住房市场上的不利境地?在住房商品化之前,城市社会中的住房主要由居民所在工作的单位分配。当时已经有许多农民进入到城市之中。当然,他们不可能进入到有正式编制的工作岗位,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在再分配过程中获得住房。在已有的文献与资料中,几乎没有农民工曾经获得过在城市工作过的单位分配的住房。一位 40 多岁的被访者的话很有典型性,他说:"我有一门好手艺,曾在国企做过临时工,但是分配房子那是吃国家粮的人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我们农民想都不敢想。"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和保障性住房制度。然而,住房公积金或保障性住房基本上只考虑那些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农民工很少能有机会获得这种住房。这就形成了一股推力,将进城的农民工推回到农村社区去。这股推力与农村地区的住房消费潮密切相关。

相关研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的这一观点。董昕与张翼通过全国 106 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证明了"农民工在老家有住房对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董昕、张翼,2012)。在其研究中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主要是指城市中的租房消费,也就是说在农村建房也与城市住房消

费水平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访谈资料反映了这种联系,“相当多的农民工宁愿将更多的支出用于老家宅基地上住房的翻新及新建,也不愿意在改善工作城市自己的住房条件上多花钱”(董昕、张翼,2012)。在农村社区的相关力量的拉动下,农民工回到农村去实践他们在城市所见到与习得的生活方式,于是一幢幢现代的住房在乡土家园上修建起来。

(二)农民工回流与农民工家庭住房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机制不仅带来了城市社会结构的改变,而且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变迁。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农村住房消费潮也随之兴起。市场机制通过哪些因素拉动了农村的住房消费?下面的模型将给我们一些启示。

表 3　　农村住房改建与装修消费支出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家庭非农收入	0. 239 *** (0. 033)	0. 245 *** (0. 036)	0. 246 *** (0. 034)
家庭教育支出	-0. 173 *** (0. 082)	-0. 175 *** (0. 083)	-0. 177 *** (0. 081)
是否有非农收入(是 =1,否 =0)	4834. 493 *** (1305. 635)	4833. 056 *** (1304. 175)	4832. 934 *** (1298. 217)
家庭农业收入	0. 071 * (0. 010)	0. 077 * (0. 009)	
医疗保健支出	-0. 035 * (0. 133)		
截距	1625. 023 (715. 34)	1634. 821 (683. 126)	1677. 632 (624. 213)
样本量	2761	2761	2761
R 平方	0. 093	0. 098	0. 101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 *** $p<0.01$, ** $p<0.05$, * $p<0.1$。

从表 3 的模型 1 与模型 2 我们可以发现,相对而言,家庭的农业收入与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对于农民的住房改建与装修的支出影响并不是很大。前者对于农村住房消费的影响之所以不大,一方面可能由我国农村特殊的土地制度引起。在我国,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很少能够引起农民的收入分化。另一方面,农业没有实现工业化,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还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农民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相当有限。

从三个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否加入其它变量,教育支出对农村住房改建与装修的影响都比较大,而且影响显著。教育支出对农民的住房消费呈负向影响,每增加 1 个单位的教育支出,就会减少 0. 173 个单位的住房消费支出,也就是说教育支出越多的家庭住房消费的支出越少。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农民为了使自己的孩子能够实现从农业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一般都会先注重孩子的教育支出,而不是选择建房在农村实践城市生活方式,因为对于农民而言,教育是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的途径。用笔者田野调查的一个被访对象的话来说,就是:“读书是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的唯一方式。”

从模型 3 中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虚拟变量是否有非农收入,还是非农收入本身都对农村住房改建与装修支出有着显著的影响。相对于没有非农收入的农民而言,有非农收入的农民在住房改建与装修上的花费较多。这不仅仅揭示了非农收入与农民在住房改建与装修之间的关系,

还反映出另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农民进城打工,从中获得了一笔相对于农业收入而言比较可观的非农收入。但是这笔收入不足以使他们进入城市住房市场之中,于是他们只能住在“城中村”,或是“蜗居”、“蚁居”。在城镇之中他们不能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于是农民回到农村将他们的非农收入投入到住房建设上,实践他们在城镇或城市中所见到与习得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建房行为也影响着那些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民们。这样一来,农村住房“换代潮”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农村大地上。

总之非农收入是拉动农民工回乡建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虽然市场机制没能够改变他们在城市住房市场的不利地位,但是却能够提供一笔资金供他们在农村社区进行住房建设,实践城市生活方式。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市场机制使得农民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可能引起了农民在住房消费支出方面的分化。然而笔者在农村却观察到与住房消费分化表面上似乎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现象也被卢晖临(2006)、陈昕(2003)等学者观察到。那就是,农民不顾个人与家庭收入水平,在农村中建设新的现代房屋,并不断翻新自己的住宅,而且这些房屋的有效面积都非常大。CSS2011 调查数据显示,农村住宅中面积在 81 – 180 平方米之间的占到 3755 个样本的 43.7%,面积超过 180 平方米的占到样本的 34.2%,从图 2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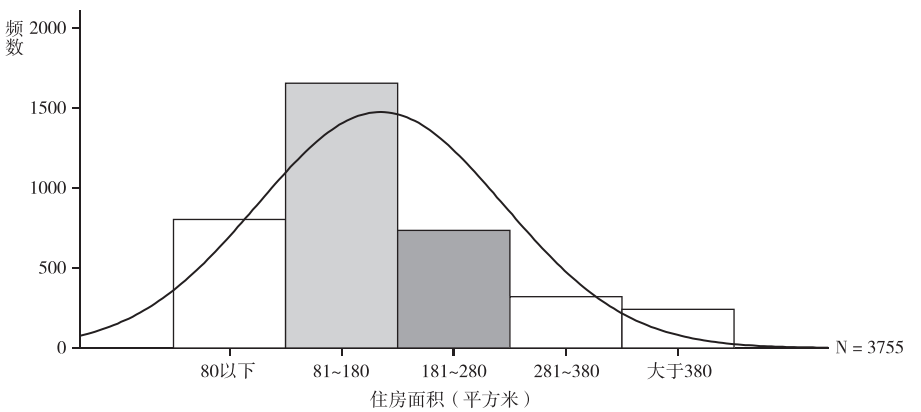

图 2　农村住房面积分布图

事实上,影响农民消费现代的住宅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制度因素是我们国家有关宅基地的制度安排。1986 年《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是符合申请宅基地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就是说只要拥有农村户口就能够获得宅基地。这一规定确定了农民使用农村土地建设居住房屋的权利。作为对这一规定的补充,1990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请示的通知》,其中就宅基地用地的审批手续作了更具体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确立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也就是说,虽然那时村民有权使用宅基地,但是却必须付出一定代价。随后,在 1993 年的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话会议上,为减轻农民负担,国务院取消了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和农村宅基地超占费。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定了拥有农村户籍的居民无偿使用宅基地的权利。

在城市中,高昂的价格使得许多城市居民尚无力购买商品房,更不用说进城务工的农民。相对于城市的商品房而言,在农村宅基地上建房的成本无疑要低得多。对于在城市中进行生产却拥有农村户籍的农民来说,虽然他们消费不起城市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商品房,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无偿的宅基地使用权在农村社区实践城市生活方式,建设现代化的住宅。同时近年来政府出台了各种鼓励农民消费的惠农政策(主要是各种“家电下乡”活动)。宅基地制度与这些惠农制度安排一起形成另一股拉力,这股拉力使得他们回乡建房,实践新的生活方式。

四、农民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的观念影响机制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得由“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加速,这种转型不仅仅表现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也表现为生活方式内部所蕴含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学者们发现我国农民正在从“集体主义者”演变为“个人主义者”,从“节俭主义者”演变成为“消费主义者”(王宁,2009)。那么,这种价值观念的变迁与农村住房消费潮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通过田野观察与访谈资料对“城市生活方式下乡”与观念转型对农村住房消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如果按照西方社会变迁的路径发展,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生活方式,而农村生活方式将逐渐被替代。然而,在中国,农村社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住房“换代潮”现象。这是传统的乡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复兴,还是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渗入,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调查。

(一)个人主义与农村住房消费

相对于传统的“共同体”而言,当代社会中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表明,基于传统阶级结构基础的群体认同与阶层意识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个人主义基础的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的“碎片化”(李春玲,2005)。郭正林、周大鸣(1996)通过对一个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剖析,认为在不发达的村落社会,外出务工是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进而提高其现代性程度的基本途径。周晓虹(1998)认为城市农民工的流动经历和城市体验,是一个普通农民完成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完整过程中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个体主义价值观念是否也与农民外出务工和体验现代生活方式相关?我们的访谈资料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有受访者曾这样向笔者陈述:

> 离开集体耕种的土地,一个人在城市中[依靠自己的劳动力挣钱],我感觉自己在生存上已经[不再需要依赖家庭]。独立生存之后,在家庭中我不再需要听别人的安排,我感觉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比以前高了,我要求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在其中我能够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时城市的生活让我有了很多[新的想法],这与我之前在农村集体中形成的想法很不一样。(访谈资料:1 - M - Z)①

从上述访谈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在外出务工的经历中获得了个人的经济独立,并在新的城市生活中习得了新的思想观念。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去集体化之后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已经渗透到农村社区之中,它正是由那些走出集体化村庄,在城市社会中从事非农工作的人返乡所带来。他们抛弃了集体生活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习得了当下城市生活方式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这与农村社区的住房消费潮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我们知道农民工虽然在外出打工与城市体验中习得了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然而他们在城市中却无法拥有私人空间,他们的个人主义观念不能在城市社会生活方式中实现。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农村社区中、以修建新住宅来实践这种价值观念。这一方面促进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在农村社区的传播,同时也促成农村社区的住房建设潮。笔者在湖南省 C 县 Z 村的访谈证明我们上文所述的关联。有几位被访者曾这样向笔者谈到他改建装修房屋的原因:

> 我曾经在 C 市做砌匠(建筑工人),在帮别人建房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城市人住的房子[卧

① 方括号及粗体为笔者在编码的过程中所添加。访谈编号中间字母 F 为女性受访者,M 为男性受访者,前面数字为对应的个案顺序,最后一个字母为受访者姓氏的首个字母。下同。

室里面有洗手间],生活更加的[方便];[各辈人分开居住],住起来也很愉快。但是我们打工的只能集体住在工棚中,日子过得并不开心。于是就想着回老家也建个高大宽敞的、城市房子式样的房屋,后来钱攒够了,我就回家修了这幢房子。(访谈资料:1-M-Z)

我在深圳的一个生产手机的工厂中上班,住在一个宿舍的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省份的人,而且我们大多不在一个车间上班,平时也没什么交往,[一起生活很别扭]。大群人生活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我们打电话的内容,一起住的人基本上都知道。那时候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自己的[个人空间],但是在深圳我们打工族是买不起房子的。于是前两年我和老公一起回来就建了这幢新房。不过还是要回到深圳去工作,常年在那边生活,因为家乡这边的工作机会太少了。真希望有一天能够发财,在深圳也能够有自己的房子。(访谈资料:2-F-L)

从上述的访谈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被访者都承认他们改建与装修住房一般都会以城市住房的样式为参考。"卧室有洗手间"、"各辈人分开居住"强调个人生活空间的住房布局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当问到他们为什么不在城市中买房而要回到农村建房时,他们大多数都回答,在城里买房是我们乡里人不敢想的,就算敢想也有心无力;当问到觉得新建的房屋比打工时期居住的房屋好在哪里时,回答中"方便"、"个人空间"、"隐私"等所包含的主体感受与"没有隐私可言"、"一起生活很别扭"等回答所包含的主体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这些鲜明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个人私密空间、强调个人舒适的价值观念已经深入他们的心中。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指引下,并在宅基地制度等其他条件的支持下,回到农村社区在老家的住宅建设去实践城市生活方式,去实践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就成为农民工如今理性的选择。

(二)消费主义与农村住房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从消费观念上看,我国城市居民经历了从节俭主义向消费主义的转变,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已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流。相对于节俭主义,"消费主义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在一种文化中的符号象征价值"(陈昕,2003)。这种价值观念背后所蕴藏的是消费的意义建构与阶层区分的作用。那么,农村社区中的住房消费潮如何受到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影响?

从图1的数据中我们知道,有效使用面积在81-180平方米的农村住宅占到3755个样本的43.7%,面积超过180平方米的房屋的数量占到样本的34.2%。可见,农村居民的住房消费行为已不仅仅指向住房的使用价值。通过观察与访谈,我们也发现,受访者家庭新建房屋时尽可能将他们的房屋修建的更高大,更宽敞,而这些房屋中有大量的房间处于闲置状态。而每当有客人来访时,他们就带领客人参观新建房屋,对住房的高级设备与豪华装修侃侃而谈,笔者在调查时更是多次经历了如此的情形。这与许多学者在我国其他地区发现的情况类似。例如,陈昕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居民即使明显意识到可能损害自己的健康,也要设法盖一栋新的房子,他们认为这完全合乎情理。在他看来农村居民新建与装修住房主要是跟形式,也就是说主要是注重住房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即主要为了表现与攀比(陈昕,2003)。通过住房修建与对其进行展演的行为,他们再生产了其在农村社区的地位。

我们发现许多曾经或者还要外出打工的农民都有过在城市中给子女或者整个家庭购买一套住房,然而在被访问者中却没有一位能够在城市购买商品房;而当我们问到他们自己修建的住房与城市的商品房哪个更好时,这些被访者大多认为自己的房子比城市的商品房要好得多。一方面对城市住房向往,另外一方面却更认同自己修建与装修的住房。下文的访谈资料就体现了他们的这种矛盾心理:

外出打工我不仅仅是为了赚那几个钱,其实我也想过城市人的生活,在城市有自己稳定的

职业与房子,一家人都能够在城市里生活。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自己在村里修建的房子蛮不错的,[比城里的房子高大、宽敞],[城里人有的家具与电器我们现在差不多也都有了],我们的房子还可以有自己的小院子,种种花草。[城里人住的肯定没有我们舒服],我们农村人日子过得并不比城里人差。(访谈资料:3 - M - H)

当年外出打工时,期望自己有朝一日发达了能够过上新生活。虽然现在还不能在城里买房子,在城里过日子。但是乡下与城里也没什么区别了。[我们的房子可以建得和城里的房子一样的格局]。[城里人有的电器与家具我们也用得起]。他们还有很多买不起房子呢!我们村里的人现在基本上都住新楼房啦!(访谈资料:4 - M - L)

从被访问的农民工关于城市与农村的住房区别的回答中我们发现,农民工以他们能够消费得起新房而感到骄傲。"比城里的房子更高大、宽敞"、"城里人有的家具与电器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等回答告诉我们农民工修建比城市更高大与宽敞的房屋,拥有城市人所使用的家用电器不仅仅与农村社区的其他居民进行攀比,也不仅仅是为了建构起在农村社区的地位。他们陷入到消费主义的漩涡之中,比较的对象是同一片国土上的城市居民。在二元社会结构的历史下,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他们希望通过在农村的住房消费创造一个平等的历史,建立一座奋斗的纪念碑。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将城市生活方式、将现代住宅引入到农村社区之中,也是对城乡居民住房不平等的一种反应。

从消费的视角来看,村民的住房消费行为还与农村的婚姻市场有着密切关系。根据相关调查,婚姻是农村新建房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一点被许多观察家所发现。如曹锦清(2000)通过其在河南省的调查发现村民外出打工挣钱的一个主要动机是"盖房娶亲"。从这一角度来看,农民消费配备现代家具与电气的住房,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其中的使用价值,而是这类型的住宅是其在婚姻市场上的文化资本。它代表了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也象征了该家庭拥有的现代生活方式。

在现代传媒以及流动经历的影响下,农村女性被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城市生活方式所吸引。然而,她们在传统家庭与劳务市场的弱势地位使他们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她们的城市生活梦,农村婚姻市场则成为农村女性追求现代城市生活梦的一个重要场域。我们对调研地未婚男女的访谈证实了这个的疑问。绝大多数的被访女性告诉笔者,拥有配备现代化的电器与家具的楼房是其择偶最重要的标准;而绝大多数的被访男性也承认是否拥有这种类型的房屋已成为其找对象的最重要的条件。

现在乡下的男人找老婆难啊!我几次相亲都失败了,也不是因为相处不来,是对方觉得我家里条件不够好。去年相了一个女的,相处了一段时间感觉蛮不错的,但是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对方要求我在县城购买一套房子,不然就不结婚了],我一个农村人哪里买得起啊。在城里打打工,挣点钱回乡建起一幢楼房就很不容易了,哪里买得起房子。后来我们的关系就不了了之了。(访谈资料:6 - M - Y)

现在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根本结不起婚。我家前几年还是土砖平房,基本上没人愿意给我介绍对象。我和我爸出去打了几年工,[挣了点钱盖起这座两层的楼房之后开始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前一段时间处了一个,我们满聊得来的。但是当我把她带回家之后,对方看到我家的房子基本上是一个空壳,里面没什么家具和电器就开始不满意了,后来我们的关系在此之后没多久就结束了。(访谈资料:7 - M - G)

从上述的访谈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代表城市生活方式的住房消费对于农村女性的影响,女性期望通过婚姻获得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我们不能指责农村女性拜金与功利,其实她们只是受到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被卷入到城镇化生活方式的潮流之中,却又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去追赶这种潮流。她们中的大多数不奢望能够真正融入城市,只是期望能够通过婚姻在农村社区中实现这种城市生活梦。

(三)集体主义与农民工家庭住房消费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还发现,在农村社区修建现代住宅的人群中还有这样一种类型:家庭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平均分配的耕地,家庭成员很少有外出务工经历,家里也没有传播现代消费文化的电脑与电视,户主节衣缩食存储了一笔钱,并向亲友借贷盖起了外表看上去与其他家庭没有多大差异的砖房。走进房子内发现房屋墙壁还没有粉刷,屋里少有现代化的家具与电器。观察户主的餐桌我们还发现他们的生活相当的拮据。我们很难说这种类型的家庭受到了城市生活方式中的消费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当笔者问及这些农民为什么要修建这样的住宅时,他这样向笔者描述:

> 我修建这个房子花了我大部分积蓄,而且还借了一笔钱。我知道建这样一座房子并不能说明我有钱,修这座房子也[不是为了显摆]。我原先是这个队的队长,在吃大锅饭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不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嘛。我为什么不能和别人一样修一座漂亮的房子呢?虽然节衣缩食才把这座房子建起来,但是我觉得值,他让我感觉到我和他们没什么区别。(访谈资料:10-M-G)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发现,这一类型村民的住房消费行为的确受到了集体时代的影响。“不是为了显摆”、“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言语体现了集体主义与平均主义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亦有学者通过讲述改革开放之后发生在一个中国村庄里的楼房竞赛故事,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农民平均主义心态。也就是说,他把农民的住房消费行为与平均主义联系起来。但是他并没有将平均主义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利用田野资料,结合更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探讨集体化经历与这一心态形成之间的关系(卢晖临,2006)。他们的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农村住房消费潮的产生与发展。集体时代在一些人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平均主义观念也深入当时人们的心中,这种观念对于农村的住房修建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住房消费潮与城镇化并不形成悖论。农村住房消费潮其实正是以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城市生活方式进入农村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农民进城打工、生活或者通过各种媒体习得了新的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但在市场与再分配制度的影响下农民其实无法真正在城市中践行这种新的观念,而“返乡盖房”则是在社会结构变迁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在当前城镇化的情景中农民工家庭所做出的一种理性消费选择。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农民工将城市生活方式引入到农村场域中,更为廉价地践行原本遥不可及的城市生活方式。

五、总结与讨论

在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选择是深深嵌于城市—农村这一连续体之中的。纵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拼命地将农民工推向城市房地产市场,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却在不断地摆脱这种影响,并将农民的住房消费选择拉回乡土社会。首先,在城市中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一起形成了一股推力,将农民工排斥于城市住房市场之外。市场机制让农民从非农工作中获得了相对可观的收入,这笔非农收入形成了一股拉力。更重要的是农村的宅基地制度与其他的一些惠农制度安排形成了另一股强大拉力,这两股拉力使得他们回乡建房、廉价地实践城市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在调查研究之初,我们曾认为农村近些年来自主兴起的“换房潮”有悖于当前城镇化进程中集中建房居住的制度安排。然而,通过深入的研究发现,这其实并非是一种悖论,一方面,农民进入城市社区之中,挣得一定的非农收入,却被排斥在城市社区之外,他们不得不选择以家庭为单位,在农村社区中以住房建设实践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认为农村住房消费选择是眼下传统城市化路径困境

下的产物,也必将对传统城镇化路径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阻力。

从另一方面看,农民工在农村社区的住房消费是在实践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农村社区的住房消费选择是城市生活方式及其相关的价值观念渗入农村社会的一种重要体现;而农村的现代住房消费又将进一步促进以消费主义与个人主义为特征的城市生活方式在更多农民之中传播,使他们更加强烈地希望实现"城市生活梦"。

在消费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再也不是原先的"乡土中国",这不仅体现在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城市生活方式进入到传统的乡村社会之中,使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现代转型。需要注意的是,将城市生活方式引入到乡村社会之中的主体是在传统城镇化路径中处于困境的农村居民,这与西方的"逆城镇化"中中产阶级将城市生活方式引入农村有着很大的区别。

参考文献:

边燕杰、刘勇利,2005,《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曹锦清,2000,《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
陈昕,2003,《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董昕、张翼,2012,《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 10 期。
郭正林、周大鸣,1996,《外出务工与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李春玲,2005,《社会分层研究与理论的新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培林、张翼,2000,《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李强,1997,《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刘精明、李路路,2005,《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刘祖云、毛小平,2012,《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 2010 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卢晖临,2006,《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关于房屋的故事》,《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闵学勤,2011,《空间拜物:城市青年住房消费的仪式化倾向》,《中国青年研究》第 1 期。
——,2012,《社会分层下的居住逻辑及其中国实践》,《开放时代》第 1 期。
王宁,2009,《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阎云翔,200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亲密关系与家庭变迁(1949 - 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
周晓虹,1998,《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周运清主编,1991,《住宅社会学导论》,安徽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责任编辑:施芸卿